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虚构
的
犹太民族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 著

王崇兴 张蓉 —— 译

Shlomo Sand

中信出版集团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Shlomo Sand

虚构 的 犹太民族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 著
王崇兴 张蓉 ——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构的犹太民族 / (以)桑德著; 王崇兴, 张蓉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3

书名原文: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ISBN 978-7-5086-6578-8

I. ①虚… II. ①桑… ②王… ③张… III. ①犹太人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①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8661 号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by Shlomo Sand

Copyright © 2009 Vers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虚构的犹太民族

著 者: [以]施罗默·桑德

译 者: 王崇兴 张 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mm×1300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5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578-8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纪念那些
曾到过这片土地
和被迫离开这片土地的流亡者们

目 录

序言 // 001

绪论 记忆的重负 // 005

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 035

第二章 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起初，上帝创造人民 // 085

第三章 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 170

第四章 沉默的王国：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 // 250

第五章 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 330

后记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 413

致谢 // 428

译名对照表 // 430

序言

本书最初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而且它无疑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包括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

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成全了我——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停留了十九周。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展现的——这令许多书评人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精神所表明的是，在21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

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象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于其中和使用其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从犹太人肚子里出来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得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能够出版并于2008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正讨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培养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将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出“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Zionism）的智识浪潮。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人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

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不用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他们并没有偏离主流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视为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独特性，看不到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否定了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却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作为一位受到认可的教授，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力量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参与塑形我所生活之社会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学家，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所显示的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有所不同——不仅在以色列内部，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也如此，这使我和我的读者一样感到震惊。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完成了思考之后，才能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

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了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几乎已经揭开了所有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一些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的有限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却长期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的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2009年于特拉维夫

绪论

记忆的重负

民族……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卡尔·多伊奇，《民族主义及其替代选择》，1969年

我认为，如果不能哭喊，如果没有一点儿酒精和流行音乐从头到尾的相助，我不可能写成我确已写成了的这部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著。

——厄内斯特·盖尔纳，《对批评者的回复》，1996年

本书是一部历史著作。不过，它将以若干个人故事开场。像所有传记性作品一样，这些故事需要自由的、有想象力的描述来给予它们生命。像这样来开始写作，会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学术研究通常受个人经历的促动，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些经历往往隐藏在层层理论之下，本书一开始就提供了一些经历。在作者通往历史真相，通往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他意识到，没有人曾真正抵达——的历程中，这些经历将为作者提供启动的操纵杆。

个人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们难以辨别记忆与文字记录之间的

微妙差别——由此，人们应该把对下面初遇的故事的描绘看作是不严谨的，部分是虚构的，尽管其他任何传记性作品都是如此。至于这些故事同本书核心主张之可能令人不安的关联，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将会有所发现。有时候，下述故事的语气确实是冷嘲热讽，甚至是忧郁悲叹的，但冷嘲热讽和忧郁悲叹自有它们的用处。对于一本试图分析历史根源，改变以色列人认同政治之特性的批判性著作来说，将它们连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

迁移中的身份

第一个故事——两移民的祖父

他的名字叫沙勒克 (Shulek)。后来，在以色列他被称为绍尔 (Shaul)。1910年，他出生在波兰的罗兹 (Lodz)。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父亲死于流感，他母亲到罗兹附近的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工人。在当地犹太人社区的帮助下，三个孩子中的两个被送给他人收养，只有最小的沙勒克留在家里。他在一所犹太教小学上了几年学，但母亲经济上的窘况迫使他在很小的年龄就浪迹街头，并开始从事与纺织品加工有关的各种工作。以上就是沙勒克在波兰的纺织品生产中心罗兹所经历过的生活。

出于相当寻常的理由，这个年轻人抛弃了他父母的古老信仰。当母亲因其父亲去世而陷入困顿之时，当地的犹太教堂命令她坐在聚会的后排座位上。在那个传统社团中，等级制占支配地位。金融资本的减少几乎总是导致象征资本的迅速减少，由此，这位母亲与受尊重的社会地位的距离反映在她同神圣的《托拉》(Torah) 的距离上面。她的儿子注意到了被排斥的势头，且发觉自己被逐出了祈祷房。在较大城市的犹太居民区，年轻人丧失信仰变得普遍起来。一夜之间，年轻的沙勒克也发现自己没了家园，没了信仰。

但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他加入了共产党，当时这是一种时尚，它使他与波兰社会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多数人相一致。沙勒克很快成为一个革命的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充溢着他的想象，强化了他的精神，推动他阅读和思考。尽管为了谋生，他做着辛苦的工作。共产党成了一个避难所。不过，因为政治煽动罪，这个温暖且充满活力的避难所不久就使他进了监狱。他蹲了6年监狱，尽管没能完成学校教育，但他的教育得到了相当大的拓宽。他没能消化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却开始熟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通俗作品，他没能实现他母亲要他进入一所犹太高等学校的愿望，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1939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沙勒克在罗兹中心街道目睹了三位犹太人被绞死——这是在街道附近啤酒吧中一些一直在喝酒的德国士兵的惊人举动。几天后，他、他年轻的妻子和她的妹妹，与向东奔向红军的难民洪流一起受到了驱逐，难民们已占据了半个波兰。沙勒克没有带着他母亲一起出来。他以后会说她已年老体弱；事实上，她那时是50岁。当犹太人区的居民开始在缓慢而笨重的毒气卡车——更高效的毒气室之前的原始灭绝技术——中被消灭的时候，她身在其中，她的年龄大概就是50岁，而且也是穷人。

当逃难者到达苏占区，沙勒克知道最好不要透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斯大林最近消灭了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勒克反倒以一种新的身份——公开承认的犹太人的身份——跨过了德国和苏联边界。当时，苏联是唯一一个愿意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家，尽管它把他们中的大部分打发到了它的亚洲区域。沙勒克和妻子幸运地被送到了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他的小姨子受过教育，且会讲几种语言，享受了被允许留在文明的欧洲的特权。但不幸的是，那里还没有被称为犹太教—基督教的地区。因此，正是在1941年，她落入了纳粹的魔掌，被送入了焚尸炉。

1945年，沙勒克和妻子回到波兰，但即便在没有了德国军队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仍旧拒绝接受犹太人。这位波兰共产党员再次处于没有家园的境地之中（除非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家园）。他和妻子及两个小孩儿只能待在巴伐利亚山脉中为难民们提供的帐篷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一位哥哥。不像沙勒克，他的这位哥哥不喜欢共产主义，而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以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观看着他们的命运：那位哥哥，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一份移民到蒙特利尔的签证，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而沙勒克和他的小家庭则由犹太人服务机构转移到马赛。在1948年底，他们由马赛乘船到了海法。

在以色列，沙勒克以绍尔的身份生活了许多年，尽管他从未成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的身份来说，他的身份证甚至没有把他归入其中。身份证根据民族属性和宗教把他限定为犹太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国家为所有公民登记一种宗教，包括确定的无宗教信仰者——但沙勒克总是更像一位共产主义者而非一个犹太人，更像一个意第绪主义者而非一个波兰人。尽管他学会了用希伯来语交流，但他不太关注语言，且一直与家人和朋友讲意第绪语。

沙勒克怀恋东欧的“犹太人的家园”（Yiddishland），怀念战前那里激昂和骚动的革命观念。在以色列，他感到自己在窃取他国人民的土地，尽管这不是他的所为，但他一直把这看作偷窃。他明显的疏离不是来自看不起他的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Sabras），而是来自当地的气候。黎凡特（Levant）炎热的空气不适合他。它只是强化了他对覆盖着罗兹街道的厚厚白雪的期盼，对已缓慢地融入他记忆中的波兰白雪的期盼，直到他最后闭上双眼。在他的坟墓边，他的老战友们唱起了《国际歌》。

伯纳多（Bernardo）于1924年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若干年后，他被称为道夫（Dov）。像沙勒克的母亲一样，伯纳多的母亲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妇女，尽管她去的是基督教礼拜堂而非犹太教教堂。不过，伯纳多的父亲在早年就放弃了对灵魂的任何特别的专注，且像在反叛的巴塞罗那的许多金属加工工人一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之初，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合作组织支持年轻的左派共和国，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控制了巴塞罗那。但是右翼的弗朗哥分子的武装力量很快就到达了这座城市，在从巴塞罗那街道的最后撤退中，年轻的伯纳多和他父亲一道战斗。

内战结束后几年，伯纳多被征入弗朗哥的军队之中，这没能软化他对这个新政权的感情。1944年，作为一个身带武器的士兵，他逃亡到比利牛斯山区。在那里，他帮助弗朗哥政权的反对者穿越国界。与此同时，他热切地等待着美国军队的到来，以击败这个残忍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同盟者。令他绝望的是，民主的解放者们甚至都没有进行尝试。伯纳多别无选择，只好穿越他自己的边界，成了一个无国家的人。在法国，他当过矿工，而后偷乘一艘船逃离法国，希望能抵达墨西哥，但在纽约被捕并戴着镣铐被遣返回欧洲。

这样，在1948年，他还在马赛的一家造船厂工作。5月的一个夜晚，他在临码头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一群满腔豪情的年轻人。这位年轻的金属加工工人，仍旧梦想着巴塞罗那那些革命的合作者们的高尚品质，且开始确信新的以色列国中的基布兹（Kibbuz）是他们天然的继承者。在与犹太教或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情况下，伯纳多搭乘一艘移民船只到达海法，并被迅速派往在拉特仑（Latrun）山谷的前线。在战斗中，他的许多战友都阵亡了，但他幸存下来并立刻加入了基布兹，正如他在马赛的那个春天梦想要做的那样。在基布兹，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女人。和其他几对情侣一起，

在一场简单的仪式上，由一位拉比主持，他们结为夫妻。在那些日子里，拉比还是开心地提供着这类服务，没有问任何不相干的问题。

内政部很快发现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现在以道夫之称而为人知晓的伯纳多，不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不能取消他的婚姻，但道夫被传唤参加一个正式会议来澄清他的真正身份。在政府办公室，他被命令坐在一位戴着大黑色无沿便帽的官员对面。那时，审慎而犹疑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zionist）政党米兹拉希（Mizrahi）掌控着内政部，它还没有坚持“民族”分界或身份排斥政治。

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大体如下：

“先生，您不是一个犹太人。”官员说。

“我从来没说我是。”道夫回答道。

“我们不得不改变您的登记证。”官员冷淡地说。

“没问题，”道夫表示同意，“请便。”

“您的民族属性是什么？”

“以色列？”道夫提道。

“没有这样的民族属性。”官员声明。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以色列的民族身份，”这位部门官员叹息地说，“您在哪里出生？”

“在巴塞罗那。”

“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西班牙人’。”

“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我拒绝被归为西班牙人。这是我父亲和我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之战斗的事情。”

那位官员挠了挠脑袋。他不懂任何历史，但他确实尊重人民。“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加泰罗尼亚人’。”

“太好了！”道夫说。

这样，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方承认加泰罗尼亚人民族属

性的国家。

“哦，先生，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是一个世俗的无神论者。”

“我不能写‘无神论者’，以色列国家不承认这样一类信仰。您母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天主教徒。”

“那么，我写‘宗教信仰：基督徒’。”那位官员如释重负地说道。

但是，道夫这个通常冷静的人，变得越发不耐烦。“我不要携带一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证。它不仅与我的原则相悖，也冒犯了我对父亲的记忆，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中对基督教堂开过火。”

那位官员更用力地挠着脑袋，权衡着选择，且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道夫带着一张蓝色身份证离开部门办公室，证上载明他的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都是加泰罗尼亚人。

许多年里，道夫都耗费心力不让他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对他的女儿们产生不利的影响。他知道以色列的学校教师经常提及“我们犹太人”，尽管事实上他们的一些学生或学生的父母可能不属于那个群体。在有些时刻，他寻求一些想象出来的与西班牙的马兰诺（Marranos，被迫的皈依者）的关联。但当女儿们长大了，并使他确信他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没有烦扰到她们时，他就放弃了那种寻求。

对道夫来说，幸运的是像所有其他以色列人社区一样，基布兹的墓地没有把非犹太人埋葬在栅栏之外或埋在基督徒的公墓中。因此，和基布兹的其他成员一样，道夫被埋葬在了同一块土地上。不过，他的身份证却失踪了，尽管他几乎不可能在最后的行程中还带着它。

过了一段时间，沙勒克和伯纳多这两位移民，都拥有了以色列孙女。她们的父亲是这两位移民的一个朋友。沙勒克和伯纳多的故事由此展开。

第二个故事——两位“土生土长”的朋友

第一位马哈茂德 (Mahmoud One) (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名字都叫马哈茂德), 1945 年出生在雅法 (Jaffa)。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战斗期间, 仍有一些阿拉伯人居民区的居民没有逃到加沙 (Gaza), 且被允许继续生活在他们土生土长的城市中。这位马哈茂德在雅法城贫困的街巷中长大, 那里定居的几乎全是犹太移民。不像在沙伦平原 (Sharon Plain) 和加利利 (Galilee) 的移民, 雅法的巴勒斯坦人处于人口大大减少和孤立的状态之中; 城市的原住民极少有人仍想维持一种独立的文化, 而移民社团则拒绝与他们纠缠或与他们整合。

在雅法的阿拉伯人的狭小聚居区, 一个出路是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年轻的马哈茂德加入了该党的青年运动, 在那里他遇到了与他同龄的犹太人。这项运动也使他能够好好学习希伯来语, 能够在相当狭小的“犹太人的土地”上游历, 并且开始熟悉它。此外, 该运动带领他超越了他在阿拉伯人学校所得到的少量教育。像波兰的沙勒克一样, 他研读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 并尝试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他的年轻的以色列指导者们喜欢他, 他也总是愿意帮助他的同志们。

马哈茂德与一位比他小一岁的犹太男孩成为朋友。他们观点一致, 马哈茂德还帮助他的朋友应对紧张且具有挑战性的雅法街道的生活。他身强体壮, 这让那位更年轻的小伙子感到安全, 而后者的伶牙俐齿有时也大大地帮助了马哈茂德。他们变得十分亲近, 告诉彼此最深藏的秘密。朋友发现马哈茂德梦想被称为摩西, 且梦想被接受为男孩子们中的一员。有些夜晚, 当他们徘徊街头, 马哈茂德自我介绍是摩西, 并成功地使货郎们和店主们相信他的犹太人特性。但他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身份, 总是重新变回马哈茂德。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背叛他的家庭。